

2009 年第一期，2009 年 01 月 15 日

## 断裂的金牌——奥林匹克运动会可能为中国和西方带来什么

古思亭，史明<sup>1</sup>

尽管有各样的由衷担忧或阴险恶意：在自己国家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政府可以以此为巨大成功，弹冠相庆。北京实现了宣布的所有目标：奥运会安全举办，高科技含量、人道与生态保护状况在国际社会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既没有炸弹袭击，也没有恐怖活动，为这次体育盛会带来阴影。开幕式和闭幕式画面多彩动人，给世界舆论留下深刻印象。现代环保的体育场馆令运动员和观众动容。兴奋剂事件少得出人意料，赛事组织臻于精确，为中国带来总数最多的金牌。志愿者的热情和出租车司机们的辛勤，让绝大多数运动员、官员和游客带着美好的回忆返回家乡。

至少在这座首都城市里，尽管市民们对奥运会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不便也时有怨言，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奥运节目或者为赛事和自己的运动员自豪欢呼。借助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灵活实际的态度，北京得以迅速平息围绕因特网管制发生的纠纷。面对抗议声讨，中国政府狡猾地报之以缄默。在指定的三个公园中进行游行示威活动的申请没有一个得到批准。即便是首都那似乎永不消散的灰色烟雾织就的夏日天空，也终于在八月中旬奥运会的第二周晴朗起来。绿色和平组织一向基本称许中国的生态保护措施，但这一次也提出了警告，空气质量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批评点之一。

中国政府以高效出色举办了奥运会——这一切是在西部省份四川于五月份遭遇了大地震这一毁灭性灾难之后不久实现的；与此同时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生产效率停滞和全球困难的多种危机。

### 金牌的阴暗面

一旦变化视角，立即可以发现北京所取得的成就可圈可点。蓝天的代价是暂时关闭工厂，限制车辆出行。迄今并未公开因为举办奥运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社会“附带损失”，官方对此三缄其口。国外积极分子的抗议未曾得到多少关注，遑论引起自我反省的讨论。一些中国公民因为提出游行或抗议申请遭到迫害，在公众舆论中激起质疑。

并非只有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体育界的问题——年龄数据不准确，教练员和经纪人追求权力等等。即便是对完美的狂热追求也不再是毋庸置疑的了：被世界舆论细而又细地揭露出开幕式上的纰漏——电视上经过处理的烟花画面，由于长相没被选用的年轻女歌手，还有穿上民族服装冒充少数民族的汉族孩子——都让人看出了东道主的矛盾心理。究竟为什么东道主必须杜绝任何哪怕是合乎人性的一点“不足”？如果唱歌的女孩子因为外形不够完美而被批评的目光稍稍打量一下，难道东道主就会因此感到威胁？部分安全防护措施以及对潜在混乱制造者的吓阻近乎神经质，在国内外都令人不安，表现出操作不够专业。

若是仔细观察首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的全国同期整体状况，则会发现上述可圈可点之处更加严重。在媒体的焦

<sup>1</sup>古思亭 (Kristin Kupfer)，汉学者及政治学者，自 2007 年 5 月以来以自由记者身份在北京工作。联系方式：[gusiting@yahoo.com](mailto:gusiting@yahoo.com)。

史明是自由作家及记者，为德国电视一台 (ARD)、二台 (ZDF) 和其他媒体工作。

点高度集中在北京的几个运动场馆的同时，上海和深圳的股市下挫了将近百分之二十。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就已让所有经济学家忧心忡忡的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下滑速度加快。这种情况有可能一一而这也在奥运会开始以前就曾多次被专家小心翼翼地提出并讨论一一动摇整个金融系统，就如同美国目前的情况。

奥运会结束以后，转移人们注意力的大事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全国范围的不满和不安便重新涌现出来。甚至在首都北京，恰恰是在数日之前还相当顺利地举办了比赛的朝阳区，数百名居民走上街头抗议重新启用一个明显有害于健康的垃圾焚烧设备。

### 比赛结束之后又回到了比赛之前的状态：中国原有的新挑战

奥运会是否“给中国”<sup>2</sup>带来些什么，对此有着似乎“完全对立”的观点。上文对这些观点的勾勒，却让人更加要问，这一盛会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被过于夸饰的民主化的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喜爱呐喊的西方媒体所发誓存在的独裁魔化现象也至今并未得到证实。至少从外部观察是如此。

从内部观察，中国政府不得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其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资源是有限的：400亿欧元的投资和政府的不断宣传也不足以将中国公众对社会的不满和批评消弥殆尽。“散户投资者”和“网友”一一二者在绝对数量上已是相当大的团体，在社会学分析中被认为是为中产阶层的核心一一的公开怨言，清楚地向共产党表明，社会角色者（soziale Akteure）对于政治的意义在增加。这场体育盛事最初被政府当作是提升其在国内外交承认程度的工具，却在中国社会内部发动了许多不同的、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形成自己独立的兴趣和见解。对此，西方在尖锐批评和带有挑战意味的敬意之外，还完全可以表示钦

<sup>2</sup> 作者们认为“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概念是指一种由不同行动者、利益和目标构成的混合物。为了语言的简练，下文仍继续使用这两个概念。

佩。更有甚者：由于双方的生活都愈加复杂和断裂，中国和西方之间相互理解的过程日趋复杂，而这正是那些断裂和矛盾所表明的。许多中国人都很难理解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和那些在中国人看来富裕而稳定的社会中存在的不安全感。

许多西方社会的人将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到中国身上，不能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断裂性：他们一方面追求作为一个平等的世界强国所应得到的认同和尊重，另一方面与自己国家内部存在的自相矛盾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作斗争。双方的媒体，往往还有政治家只展示自己和别人的极端画面，不是美好闪亮的世界，就是最黑暗的深渊，如此为双方互相理解增加了额外的困难。

### 早已不再是创纪录的论断：现有政治体制无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政治

除了政治领导人以外，越来越多对立的、受不同利益驱使的、如“小投资者”

（<http://bbs.people.com.cn>）或受审查的“网友”（例如 <http://bbs.cyol.net>）等团体一一如果我们忽略他们所有过激言辞的话一一常常在网络论坛里坚持他们的论题，以吸引广泛的关注。这一发展态势我们从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领导人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到，他们看上去可并不比奥运会开幕式时轻松多少。中国的奖牌总数无法弥补个人的财产损失、缓和被压制的不满情绪一一比如对于通货膨胀的不满。现在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在奥运之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背负的经济政治压力明显加大。

奥运期间，政府对于记者等国际角色者的态度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同样的问题。可以说奥林匹克媒体中心对于互连网的管制意义微弱，只是给北京的形象带来了无谓的损害，因为，如果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历史没有深刻的了解，没有受到家乡高度商业化市场的驱使，绝大多数外国记者即使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

也不会想到去传播关于天安门事件和在中国被禁止的法轮功的敏感信息。

从长期权力效益出发，单纯在管理上北京就几乎没有足够的资金而且在技术上也不可能做到只开放互连网上特定的IP和门户网站。果真如此，政府就得24小时不间断地忙于使用过滤词、网络警察和论坛写手来监控互联网。除此之外，北京还承受着来自外交方面的压力，对于这一压力北京最近不得不表示屈服：当局已大大放松了对全国网络的监控，虽然只是局限在奥运期间。对于这次“放松”其实没有人表示感谢和满意。

如今，行动者，尤其是网络行动者给中国政治家施加的压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因为，如今的中国政府即使能够管制互联网，却再也无法完全禁止这个现代化的交流手段。甚至奥运会开幕以前，北京如此重视网络讨论，以至于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锦涛愿意用几分钟时间和互联网的使用者进行一次“直播聊天”，当然所提的问题都已事先做好准备。政府曾正式宣称，北京将逐渐加大作为情绪气压计的互联网的作用，以测量“民意”和“民情”，对此广大民众将拭目以待。门户网站将增加各种在线调查，主要涉及具有指导性并且敏感的话题，如涨价的影响，或交通限行规定的延长等。这些公众渠道有助于整体政治意志的形成，往往只能被互联网上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中产阶级加以利用，农民等其他社会阶层或团体的烦恼与愿望则没有人倾听。

即使在奥运开幕前夕以及奥运期间，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也如同野火一般不断复燃，如最近受到民粹分子欢呼的一个进行报复行动的市民（杨佳），因为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上海杀害了六名警察。这些抗议的根源表明，在一个政党统治凌驾于一切的法治国家里，信任基础已被侵蚀。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九月中旬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警告说，市民和地方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进一步激化。滥用职权和集体贪污受贿等行为让中央政府也束手无策。而对于不够透明的房地产市场、无法看清的股市

行情以及自己的个人住宅缺乏保障等问题，城市中产阶层的不满也在不断增加。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指出这些不明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无效经济之后，于九月初提出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实现法制国家的建设。尽管城市中产阶层是现存体制的受益者，但是他们对于北京的不满也越来越多，这给北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促使北京实行一种更为有效的、减少既得权利风险的政治。

### **有志者，事竟成？北京和政治体制改革作斗争**

中共高层是否存在系统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和意愿、对此是否可以达成共识，这一点目前尚不清楚。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中共中央党校在年初提交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是一份保守的、在有些地方甚至有些倒退的政治纲领。政府将过去一度属于敏感词汇的“民主”、“新闻自由”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概念进行了自己的诠释，就连“示威游行的权利”也因奥运会的特殊规定而不再成为禁忌，在激烈的讨论中也不再具有政治威力。

地方政府乐于试验已是由来已久并还将持续下去：由于工人和企业间持续不断地发生冲突，目前，中国南方城市深圳正公开讨论是否可以让工人自己选举企业工会成员。人们可以这样设想：中国的领导在实践中将会认识到，独立选出的工人代表将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比较自由的互联网和抗议活动带来的结果也可能给中国的领导层带来勇气：因为所有的嘲讽和批评都没有真正动摇它的政权。奥运期间，在指出西方媒体报道内容上的缺失、在获得自己媒体报道以及中国网络社会中部分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中，北京非常容易地接受了更为自由的条件以及西方媒体更加深入的新闻报道，甚至对其加以利用做有利于自己的报道。

中国领导层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目前最明显的论题就是经济政策：最严重的

问题到底是通货膨胀还是工厂不断关闭导致的工业生产面临危机？经济增长应该放缓还是加速？直到今年七月，北京的工作重点仍是降低通货膨胀。七月中旬，温家宝总理就基本面问题做了一次讲话之后，支持采取促进经济增长措施的声音在增强。不过，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出现放松贷款发放的迹象以及国家性的经济发展计划。

## 我们是中国人：自信心逐渐增强的中国人民

奥林匹克运动会向中国和世界展示了北京居民，他们对奥运会的限行规定满腹牢骚，常常以中国获得的金牌数作为安慰以忘却物价上涨和股市下跌的经济状况。观看比赛的人越来越喜欢随性地表达情绪，用讨喜而又热情的方式为他们的运动员呐喊助威。

虽然北京宣布将对互联网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中国网民们仍然不断抨击奥运会期间的高度戒备与普通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他们——包括在线下——将中国跨栏明星刘翔因伤退出比赛这一事件变成了中国人断裂的情感世界和思想世界中的中心话题。

人们不再吝惜眼泪，哭泣也不再是羞耻，断裂性也同样不再被遮掩：许多中国人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一个全面多彩的强国展现自己。但在同一个人身上，与这种自豪感紧密相伴的是对于政府的批判性反思，如对于安全检查、金牌狂热以及奥运花（浪）费等问题的反思，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在少数。他们不会因为奥运会的完美组织而原谅奥运会游行区由于没有示威申请获得批准而形同虚设这一事实。当两位中国老年妇女因反对拆除自己的房子而提出抗议申请而被判处一年“劳动教养”时，有许多人在关心她们的命运、质疑判决的意义。

比赛场地上以及周围的欢快激昂的奥运气氛、在公共场馆的偶然相聚，这些可能加强了城市人群曾经经历过的、具有

身份认同感的团体意识。人们手持中国国旗和奥运会旗摆出各种姿势，情绪高昂地和其他不认识的中国人一起庆祝自己国家运动员的胜利，与法国人、美国人和非洲人一起为他们运动员的成绩而担心。我们在北京街道上并没有看到西方人长期畏惧的狭隘的中国民族主义——一个成熟的标志？中国人对于跨栏明星、前奥运冠军刘翔因伤退出比赛这一事件所作出的集体反应也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国内国外，刘翔都可以说是由公关人士专业打造出来的一个既有能力又亲切和蔼的中国形象。他应该证明了，在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西方始终占优势的——田径项目上，中国站在了和西方平等的位置上。然而当这位体育明星泪流满面地离开赛场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为无法实现的骄傲而陷入一种集体性的失望情绪。取代统一的失望情绪，人们有的悲伤，有的气愤，更有很多人在为刘翔担心，此外，还有人权力利益和自己国家体育系统机制进行反思。我们应该如何在政治上评判这些对于“应该形成身份认同的盛事”具有如此多元化的集体反应，是否这种多元化也会在其他类似集体事件——诸如抗日战争，朝鲜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当代许多事件——的评论中出现，我们还将拭目以待。鉴于2009年是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20周年纪念日，中国政府有足够理由去深入研究这些新的社会形式可能带来的后果。

## 寻找自我——许多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已经断裂

与政府在城市群中尝试进行的政治统一化动员相对，允许身份认同的群体感受的多元化将会加速形成具有不同利益和目标的精神的、有休闲时间的网络团体。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此不同的中国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相对于民族大义如对奥运会的自豪感，中国人更会在关于食品价格、股市及房地产业的发展这些无法阻止的辩论中表明自己的不同观点。而在高加索冲突中中国应该怎样对待俄罗斯这类问题的激烈、甚至脱轨

成为互相谩骂的辩论中，中国人则会阐述自己在生活观和世界观上的不同意见。“只要俄罗斯人替我们中国人打击美国人，他们就是好人”，这种简单的公式即使在感情上也得不到赞许。同样不能获得苟同的公式还有：只要我们国家对外是一个奋发向上的强国，我自己的生活就基本正常。

若要将这种城市公众思想交流场景的改变恰当地和政治上的改变作相应的对照，还需要包括西方汉学界在内的更深入的工作。当然，今天所观察到的现象还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得出简单的结论。但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城市的行动者不仅至少有能力在虚拟空间坚持讨论某些问题，而且也把自己和那些被大量宣传的半官方（比如民族主义）人士更加清楚地区别开来。

尽管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中国网友、特别是国外网友对于西方双重道德标准和整体优越感所进行的合理批评以及民族主义的攻击来引发中国国内的辩论，从而确立自己的地位，但还是有相当多的网民，尤其是在国内，正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尝试形成自己理智的和情感的判断。眼下就可以看出，恰恰是这些“新”的行动者不单针对政府一方的传统阐释，也针对西方的解读去寻求并找到一些极其复杂的反思：反对或是赞成中国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简单地与反对我们或赞成我们等同起来，从而在形式上将我们所推测的思维发展趋势推上了巅峰。

### 渴望安全——中国和西方的不安全感

感谢互联网等事物，中国人如今也可以让全世界倾听自己的意见，这样的中国人一般具备两大特征：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足够的时间。超级富裕的上层社会尽管有钱，但没有时间和动机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长时间并大量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断扩大的下层社会虽有充足的时间，却大多几乎连满足自己基本物质生活的资金都没有。虽然这方面还需要更准确的社会分层，但是可以确定的

是，特别是网络上的讨论暴露出的主要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情绪。

这个中产阶级的变化是其他阶层所不能比的。高层党政领导人的孩子在改革中无论何时都不必真正担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90年代，西方媒体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报道，说从今以后甚至“资本家”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这个阶层的成员几乎都要笑晕过去：难道中国南方的大企业里最早的首席执行官

（CEO）们原来不都几乎是有党员证的国家干部？人们根本就不需要再来请这些“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党内。包括借奥林匹克之机大赚一笔的那些企业，大多属于这个小圈子，正如蓬勃发展的房地产行业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对比图：除了改革政策刚开始实行的那几年——关于这点几乎中国的所有社会学家都同意——农民是中国转变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输家。教育、医疗和养老——中国人称之为“新三座大山”<sup>3</sup>

（过去的三座大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编写的历史书中压迫劳动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走狗）——体系的“产业化”主要造成了这部分群体的负担，此外，巨大的“数字鸿沟（digital gap）”也造成了这个群体的成员很少能够分享爆炸式发展的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好处。

相对而言，今天的“中产阶级”不仅仅经历了中国最大的变革。直到前不久，这个阶层的成员都还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但正是这点现在也在改变，而且并非自奥林匹克运动会始。他们刚刚购买的住宅对于包括非常富裕的中国南方在内的许多人来说，成为了贷款陷阱，通货膨胀使得现有的财产价值缩水，而且价格下跌使得住房的转售价值也迅速回落。

自从2005年温家宝总理领导下的政府非常勇敢地承认医疗体制改革的失败之后，共产党领导阶层至今还没有提出一

<sup>3</sup> “新三座大山”一般认为是教育、医疗和住房——译者注。

个新的方案取而代之。这也慢慢让中产阶层的人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做昂贵的手术。全世界的股市都在下滑，可按照受害者的感觉，跌得最快的就是中国股市，这导致中产阶层其他购置梦想的破灭。因此，即使是奥运会的辉煌表现，也无法使得这些人（即使是在共产党的机关《人民日报》网站bbs.people.com.cn上）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充满危机的资本市场上转移开来，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 坚持就是胜利——中国中产阶层奋起直追

当然，中国城市社会这一结构的准确意义尚可商榷，但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中产阶层正是那些面对西方批评表现非常矛盾的中国人。他们常常在中国的论坛里、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之间发表批评，但如果同样的批评由西方人提出，那么，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将之视为是对他个人的丑化或冒犯。人们有一个印象，似乎这些人之所以在中国的崛起中有着非常深刻的认同感，是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因而每一个针对中国的攻击，都会被视为是对他们自身的攻击。

但是，同样是这些中国人也最害怕会在经济下滑的危险中失去自己的地位，而且速度比他们想象得还要迅速。面对股市下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解放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始终被共产党视为建立自己政权并走向成功的时间标志）。胆战心惊的人们害怕所有的不祥之兆，尤其是来自西方人的征兆，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他们已经从西方人那里完美地学到了一切：比如在股市上玩转资金的现代手段——目前有一个由五千万至七千万“小投资者”组成的联盟，在因特网上用一种外人几乎看不懂的术语热烈争辩：谁用了什么策略因而只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受到很小的影响；谁又是什么样的骗子，又是怎么成功的，有多长时间，等等。

难道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吗：很多西方人在表达他们赞赏并害怕一个努力前进的中国时，总是一遍又一遍、越来越多地提及成长中的中产阶层。以绝对数字来看，这个中产阶层让西方各个国家的每个市场统计数据都相形见绌：两亿人口拥有手机；1.8亿网民；每年以六位数增长的汽车所有者等等。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也许会抢走西方劳动者的工作，这也是不断被西方指控的一点。但是，现在中国的工资和生产成本也开始提高。

中国的超级富豪即使与伦敦、苏黎世或者法兰克福这样的金融大都会相比，在魅力方面也毫不逊色，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算什么，因为印度或者巴西那里的超级富豪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俄罗斯的富豪们了。但是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有一个上升中的群体能像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样给人以深刻印象。

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在这里是否只看到了中产阶层在物质方面的追赶？从而忽视了他们矛盾的心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衰败的恐惧、他们的骄傲以及时不时出现的、曾在欧洲导致了法西斯倾向的复仇心理？西方媒体常常或多或少隐蔽地计算有多少中国人富裕起来，尽管这点或多或少具有明显侵犯人权的性质。这给西方社会的共生关系亮起了警示灯，他们也主要是由“中层”支撑起来，因而正好在这方面害怕竞争。他们因为中国的中产阶层感到不安，后者却带着对完美的过度追求、带着“我们一定会赶上你们的”这句集体誓言，咬紧牙关拼命努力，试图迎头赶上：所有这一切都在今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尽其展现。

## 你想要别人做什么——中国的和西方的愿望

在中国中产阶层的断裂性后面，肯定也隐藏着他们对于媒体作用以及来自媒体的表扬和批评、正面和负面报道所持的不同理解和习惯。在别的国家应该说些什么、如何表达，中国和西方社会对于这方面的行为准则有着相当不同的定义。在西方国家，批评的言语代表的是不同的观察方式，在最好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对对方的尊重，而在中国，或真或假的恭维以及对批评的保留才能维持积极稳定的人际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在中国中产阶级这种矛盾反应的背后并不存在西方社会常常公开谈论的那种轻率的民族主义。在国家 and 世界的彻底变革当中，一个不安的民族更加渴望西方社会能够在过于片面强调的批评之余给予自己以肯定和赞扬。在跨栏运动员刘翔因伤退出比赛之后，许多中国人紧张而又小心翼翼地等待着西方新闻界的反应。对于许多人来说，世界新闻界特别柔和而体贴的言辞，无疑为倍受打击的民族心灵抹上了一贴止痛药膏。

中国和西方在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影响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期待和冀望。中国政府，包括许多中国人，希望世界能够承认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在发展、开放、完美服务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符合全球化规则的得体的行为举止。而在西方国家，许多人希望在社会、生态、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能够看到明显的、可持续的、名为全球化、实为西方化的变化。在这个希望的背后，西方政府和部分民众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民族自决的、多元化的并且繁荣昌盛的中国社会。许多中国人觉得西方政府，尤其是欧洲政府的批评是机会主义的、有利益导向的，这并非没有道理：柏林或者巴黎一会儿对中国政府在政治以及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表示赞赏，一会儿又对此进行批评，端看国内政治利益的需要。

和中国方面一样，在广义的西方公众社会内部，这种往往非常善意的、希望中国有所改变的愿望——包括所有那些为改善全世界人权状况而做出的值得称赞的、充满理想的努力——同样也隐藏着巨大的不安和断裂感。由于全球政治和经济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中国地位的上升，西方社会也处在变革之中，正在经历这一切的许多西方人认为，这场变革将威胁到曾经被他们认定相对安全的物质财产、社会地位以及规范和价值。要是中国能够发展得“像我们一样，像我们熟悉并了解的那样”，很多人似乎都这样想，“那么这么一个巨大的、陌生的国家对于我们就不再是那么令人不安，也不再是威胁了。”

## 共赢——为什么西方应向中国伸出手

如果要在中国政府和西方当局之间，当然首先是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那么，就必须把全球和国家变革所带来的共同的不安和断裂理解为一种机遇。

因为那些双方感兴趣的话题和问题，其实是共同的。中国和西方媒体在谈及奥运结算及后奥运问题方面时，看问题的角度都很类似：北京的生态保护措施是否可持续，奥运会对于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有何影响，“游行示威区”的意义何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

许多中国人都要求西方对中国能够做一个切合实际的、鉴定式的评价，这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评价不应该只局限于中国积极、美好的一面，而应该本着尊重对方的精神同时对于进步和问题给予评价。中国的决策者，当然首先是国内外中国公众的呼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这一评价过程给予支持——就像已经开始的那样，——这些方式包括超越正、反论点、超越自卑感或优越感的自我反思以及中国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观察视角。

然而这首先要求西方的决策者和西方公众能够给予中国人复杂且常常是矛盾的

情感以及中国的发展以更多的理解，因为共和国及其公民除了必须克服众多的内部问题以外，还要艰难地走近一个西方化的全球化世界并从中找到自我。

作为一项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除了具有全面的动员力量以外，还再次表明，无论是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国际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以西方标准为度量尺度的。

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认为不但需要禁止吃狗肉，还要以“尊重西方客人”为由限制其他一些无害的习惯如把T恤衫从下面卷起来——夏天时一些老年男子会这样——甚或中国人的行动自由。居委会以极大的热情教会北京市民应该如何与外国的——显然主要是指美国和欧洲的客人——“朋友们”相处，哪些问题可以问，哪些不可以。虽然中国已经有些人努力尝试过，但大多数中国人连同政府却从来没有想过，西方的客人也可以并且应该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中国人相互之间也会严肃而伤心地痛斥自己“落后，不像西方那样文明”。

在国内外广受称赞和喜爱的开幕式缺少了一样东西：即对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展现，也许是因为许多当

代事件和发展尚没有官方定论并会引起许多爆炸性问题，也许是因为共和国60年的历史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来说，在北京的眼里并不重要。但这也许也表明了，和其他所有非美和非欧国家一样，中国对于自信地建设自己的现代化、自己的当代文化感到并不容易。

奥运会期间爆发的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战争也让中国和西方世界同样清楚，北京很难简单选择其中的一方进行声援。由于自己国家内部的一些独立要求，中国政府对于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立场并不认同，但因此而附和西欧和美国的批评也不符合中国的立场。可见中国自身的利益显然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因此，西方集团应该对中国的矛盾性和断裂性采取一种宽容、扶持的理解态度，而不应该一拍两散。

-----  
来此德语原版 („Gebrochenes Gold - Was die Olympischen Spiele in China und im Westen in Bewegung bringen könnten) 翻译成中文。

---

· 出版者：欧盟—中国民间社会论坛亚洲基金会。Asienstiftung für das EU-China-Civil-Society Forum.

协调

亚洲基金会

Asienstiftung

Bullmannau 11, 45327

Phone: ++49 - (0)2 01 - 83 03 838

Fax: ++49 - (0)2 01 - 83 03 830

klaus.fritsche@asienhaus.de klaus.heidel@woek.de

经济工场协会

Werkstatt Ökonomie e.V.

Essen Obere Seegasse 18, 69124 Heidelberg

Phone: ++49 - (0)6 221 - 433 36 13

Fax: ++49 - (0)6 221 - 433 36 29

奥地利：Südwind Agentur, Franz Halbartschlager, Laudangasse 40, A-1080 Wien, e-mail : franz.halbartschlager@oneworld.at

“欧盟—中国：发展社会和生态公平的民间社会伙伴关系”项目是由欧洲联盟资助的。这个项目所代表的立场不能作为欧洲联盟的立场看待。



Das Projekt „EU-China: zivilgesellschaftliche Partnerschaft für soziale und ökologische Gerechtigkeit“ wird vo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gefördert. Die vom Projekt vertretenen Positionen können in keiner Weise als Standpunkt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ngesehen werden